

文  
史  
沉

## 师陀与杨刚的交往

□慕津锋

85年前,香港《大公报》的一个人事变动,为作家师陀创作反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争斗》创造了机会。事情的起因是:1939年8月,《大公报》副刊主编萧乾接受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在《大公报》的资助下,决定离开香港赴英讲学,同时还担任《大公报》的驻英特派记者。职位空缺后,《大公报》雇用一名因循守旧的北方作家,但萧乾却坚持推荐他的作家朋友杨刚,但《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对杨刚的共产党员身份很有顾虑,认为这与《大公报》“不党不私”有悖。

萧乾则以“商业报纸赢利需求”力劝胡政之:杨刚爱国,她笔头快,判断力远比我强,1936年你不是说过“兼容并蓄”吗?如果把你那位请来,刊物会马上回到1923年以前的学院派老样子,而今天已经抗战了!我保证所有多年来同刊物保持联系的作家们,都会同报纸分道扬镳。

第二天,胡政之经过认真思考后要萧乾发电报惠请当时还在塔斯社上海分社担任英文翻译的杨刚前来香港。收到萧乾的电报后,杨刚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此事。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听后,考虑到上海成为孤岛后,非常需要骨干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主张杨刚不要去。杨刚内心很想去香港工作,但作为一名党员,她首先要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杨刚只得电告萧乾,告知自己目前无法前往香港就职。但电报刚发出不久,从香港到上海的南方局负责同志获悉这一情况后,力主杨刚前去《大公报》,这样更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经过认真考虑,党组织同意杨刚去香港接手《大公报》副刊的工作。得到通知后。杨刚立刻给萧乾发出第二封电报,告知自己接受邀请马上动身前往香港。8月底,杨刚抵达香港。

1939年9月1日,杨刚正式接替萧乾开始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担任《文艺》和《学生界》两个副刊的主编。上任后第四天,杨刚发表了《重申〈文艺〉意旨》,她决心将《大公报·文艺》打造为文化战士,她要为《大公报》副刊“环上甲胄,披上战袍”。

杨刚为此特意提出:“《文艺》副刊在这风雷剧变的局势下,……永远是帅字旗下的‘一名小兵’。”

为让《大公报·文艺》香港版摆脱以往“尽量不登杂文”“不参加文艺界任何斗争”的传统,杨刚决定扩大副刊的刊登范围,尽可能多地刊登符合共产党革命思想的各种作品以影响社会,并提倡:凡可以称为文章的东西,在《文艺》的岗位上应该是一位击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袭,奇动,各中要害。《文艺》在抗战上没有躲避宣传,今天也无所谓标榜。

正是在杨刚的主持下,《文艺》《学生界》两个副刊增加了来自敌后游击区作家的战地生活报告等内容。据统计,《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共发表来自延安的作品118篇,其中萧乾主持期间发表44篇,其余74篇都是由杨刚编辑发表的。

1939年10月,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文艺》副刊特地在香港文艺界发起了一场关于“民族文艺”问题的讨论。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郁风、刘思慕等十多人参加了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在《文艺》副刊上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论反响,“民族文艺”一度成为香港文艺界的热门议题。1940年,杨刚又发起了一场“反新式风花雪月”的大讨论。为此,她发表文章《反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旗帜鲜明地反对弥漫在香港的“世外桃源”气息,并批判香港文学界迷茫的个人主义倾向和对祖国空虚的呼喊。这场讨论再次在香港文学界引起了更为热烈和广泛的反响。乔冠华、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人积极赞成杨刚的观点,主张战时文艺应该为抗战服务,创作者要努力写出有血有肉、反映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此外,杨刚在主编《学生界》时,非常关注香港学生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她常通过互动方式将《学生界》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再拉近。

除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歌颂敌后军民的感人事迹之外,杨刚在主编《文艺》和《学生界》副刊期间,还积极邀请解放区、沦陷区作家创作敢于大胆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腐败黑幕以及反映中国人民积极抗日救亡的作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师陀受杨刚邀请,开始根据自己经历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创作长篇小说《争斗》。该小说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前后,革命青年杜兰若、革命教师马已吾,以及进步学生杜渊若、胡天雄、李文多、瑞莲等人在筹划以及进行和平游行示威时遭遇血腥镇压的故事。小说还描写了年轻女学生瑞莲因遭受国民党反动军警残酷殴打而不幸去世,她的母亲董太太进城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

《争斗》不是师陀为香港《大公报》创作的唯一作品。根据《师陀著作年表》《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和《〈师陀全集〉中〈师陀著作年表(增订稿)〉勘误》可知,1939至1941年,师陀为香港《大公报·文艺》还创作出短篇小说《颜料盒》《桃红》《恶梦》《贺文龙的文稿》《塔》以及散文《方其乐》《归途》《上海的难民》《战时一景》《风波》《招顶》《住了》《淑女》等作品。

由此可见,那一时期师陀对于杨刚的邀约回应得十分积极。杨刚对于师陀的文章也是全力支持。谈及师陀与杨刚的交往,最早还要追溯到1935年。晚年的师陀在1988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曾发表回忆文章《两次去北平(续篇)》。在文中,他两次提到杨刚:

约在一九三五年冬天,萧乾同志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在《大公报》主编《文艺》普通版,前来北平宴请写稿人。被宴请的人全住在北平,却分为两批:头一批是周作人、俞平伯、杨振声等人,第二批是冯至、吴祖缃、屈曲夫、刘白羽、杨刚等人,其中也有我……在我们那批人中,杨刚是活跃分子,到处跟人碰

杯,到处找人谈话,并教我以后多跟她联系……杨刚大约是地下党员,跟顾颉刚合编过一份综合性刊物,我曾写过稿。

我第二次去北平,就现在还记得的,还有下列几件事。首先是开高尔基逝世纪念会,地点是海甸燕京大学,通知我前去参加的是杨刚。

由此可知,杨刚与师陀1935年冬便已相识,1936年当杨刚与丈夫郑侃帮助顾颉刚编辑中国早期社会综合刊物《大众知识》时,就已向师陀约稿。

1937年6月20日,杨刚还在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51期发表了《里门拾记》一文。在文中,她对好友师陀1937年1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短篇集《里门拾记》进行了十分中肯的点评。《里门拾记》是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4集之一,该书共收录师陀《毒咒》《过客》《秋原》《受难者》《巨人》《村中喜剧》《路上》《雾的晨》《酒徒》《倦谈集》《巫》《百顺街》等12篇短篇小说。在文中,杨刚认为:“这是位出过一册《谷》和一本《里门拾记》的人,还有一些他自己所谓的‘鸡零狗碎’……里门拾记是辛酸的,哭哭笑笑的,但也掩不了它字里面的和善,那使他在恶骂的时候并不见出刀笔,以及他自来自去无所依赖的笔锋,那初读来,令人想到鲁迅,细究,却以为鲁迅近于官能笔,芦焚则渝云点染,取其神似而已。”在文章的最后,杨刚对师陀有过这样的评价:“倘若中国的农村小说有它的前途,芦焚正在试着一条中国的有些迷惑性的路径,这条路可以像晦涩诡僻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发出来。”可见,杨刚对于师陀的写作是十分认可的。这也为师陀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争斗》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1940年11月至12月,《争斗》前7章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和《大公报·学生界》连续刊载。

但在《大公报》连载7章后,《争斗》却因故停载。至于原因,师陀在自述中说是“因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可据相关文献研究资料显示:《争斗》第7章最后一部分发表时间是“1940年12月31日”,而香港《大公报》停刊时间是日军即将攻陷香港前夕的“1941年12月13日”。《争斗》的停载与《大公报》的停刊相差有近一年的时间。可见,师陀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停载《争斗》,1941年1月4日香港《大公报》在《大公报·文艺》第1002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 启事

《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

编者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足信。因为,师陀当时生活较为贫困,他常常为生计发愁,而稿费是其重要的生活来源。为了生存,师陀需要不间断地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而且小说《争



「李媽,李媽!」杜蘭若坐在火爐前面喊。  
杜蘭若是瘦弱,憔悴,看起來有三十歲或者三十多歲了,雖然她的實在歲數要小得多。她有一個小小的鐵棕色的臉,小小的好看的鼻子,她的各部分——手、腳、頭都是小的,比起她的這些部分,她的身體是長了一點。然而,她是瘦得這麼可憐啊,她的小耳朵是透明的,她的手是見骨的,她的嘴——自然它是紅潤過——是失去了血色的。當地抬頭望來的時候,一根頭髮從她的乾燥的額頭下來。她手裏拿着一本書,她整整一個下午就拿着這一本書。她好像是怕冷似的縮在火爐前面的椅子裏,一匹小貓——一個灰色的小東西在她的腳邊打呼嚦。她的眼睛——在不久以前還是透明的,現在是混濛的,他是潤滑,發炎,怕光,當它看著她手裏的書,它便像一個老婆婆的頭的輪船來。這本書上正說着,至少是在這個時候,它正說着跟她沒有關係的話。

「革命之所以能夠勝利這樣迅速和這樣『激進』(表面上,粗看起來),祇因為這種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完全

1940年11月至12月,《争斗》前七章在香港《大公报》连载

斗》已写到第7章,师陀不大可能“因病”轻言放弃该小说的创作。这背后的原因应是小说《争斗》直接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入侵的民族精神,这让港英政府十分紧张,害怕得罪日本而强令《大公报》不许再发表该小说。作为我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杨刚在面对港英政府和《大公报》上层压力时,为了守住《大公报》副刊——这个来之不易的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不得已最后选择暂时停止连载《争斗》是很有可能的,而真实原因又不能对读者言明,故只能编造一个理由。

但师陀并未放弃,时隔6个月,1941年7月他将与《争斗》前7章一脉相承的后两章,以《无题》为名,在上海租界的《新闻丛之二·破晓》上继续发表。只是可惜,其后再也没有继续发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1月9日晚,奉党组织命令,杨刚随同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羊枣、胡绳、廖沫沙、于伶、叶以群等文化名人撤出香港。

其后,师陀与杨刚似乎很少再有交集。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研究馆员)

征集手记

## 将作家跋涉文学山川的灵魂郑重交付未来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家资料征集手记

□徐 堂

2024年随着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有序推进,我有幸参与了向历届骏马奖获奖作家征集文学资料的工作。我们需要在半年内征集十余位骏马奖作家的资料,虽然最初受领此任务毫无把握,但随着多次的沟通和交流,征集资料工作渐次开展。我未曾想在这特殊的工作模式下,竟被无数细节中所流淌的暖意击中——原来岁月柔光的力量,就藏在一事、一情、一语间。

## 在文字中守护纳西族的灵魂

因所学专业的关系,我对纳西族流传至今的东巴文有一定了解,知晓它源于纳西族的宗教典籍《东经巴》,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象形文字,字形极具绘画特征,距今千余年仍被使用,被誉为“活着的象形文字”“文字活化石”。尽管有此了解,但当一幅东巴文书法真迹铺陈眼前时,它仍然瞬间攫取了我的目光,令我心潮激荡。这幅“多读书,眼明亮,心安宁”的箴言书法之作,由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捐赠,每一笔线条都富有生命的灵力,大大的眼睛,装饰成册的经书,光芒万丈的太阳……它们不似写出的符号,而已化作生动的图卷。和老师以笔墨绘故土风物,深谙东巴文化之魂,此前已将两部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学手稿《连长的耳朵》与《东巴妹妹》交付文学馆珍藏。但为何这次捐赠的物品并非文学资料,亦非她的亲笔手迹,而是由杨福泉先生执笔的东巴文书法?

杨福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是纳西学、东巴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书写的东巴文经过学术论证与确认,在结构、笔画、含义上具有准确性,并遵循传统书写规范,一幅书法作品就是璀璨古老文明的一份物证。和老师坦言自己并不掌握东巴文书法技艺,但这并未阻碍她对民族文化灵魂的深入探究与深情守护。她所珍视的东巴文,早已超越了一种书写工具,而成为纳西族古老灵魂的象征符号,如一座桥梁,可以通向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处。深究起来,这看似“无关”的捐赠,实乃用意至深:和老师以文学书写纳西的骨血,她的创作从土地深处汲取力量,以多元叙事策略激活传统,使纳西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杨先生则以学术守护东巴的文脉,他是构建现代“纳西学”学科体系的核心推动者之一,著有大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专著。二人一者如歌,一者如史,共同构建了东巴文化在当代从“世界记忆遗产”转化为“活态传承”的两种路径。和老师郑重交付于文学馆的不仅是一种文字的载体,更是一条具有生命的文化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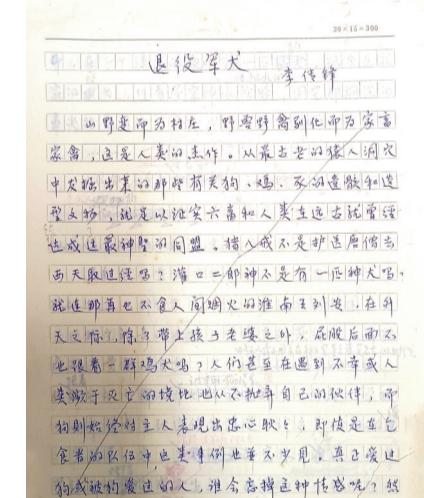
博物馆里收藏什么?岂止是物质载体?一尊青铜鼎,彰显的是礼乐之精神;一枚玉佩饰,诉说的是君子之德行。一幅东巴文书法,承载的正是



杨福泉东巴文书法作品,内容是“多读书,眼明亮,心安宁” 徐莹供图



龙仁青捐赠白色海螺 龙仁青供图



李传锋短篇小说《退役军犬》手稿 徐莹供图

纳西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密码,其价值早已超越书写内容本身,它沉默无言,却比万语千言更为厚重。当文学馆收下这一方纸墨时,分明珍藏的是作家与学者的拳拳文化之心,以及古老民族奔流不息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传承。

## 如海螺声悠扬远播

当我向作家们征集那些凝结了深厚情感与丰富才思的民族器物时,汉藏双语作家、翻译家龙仁青向我提及他珍藏的一枚白海螺,以及包裹着它的、极富藏族特色的布袋。在藏族习俗中,馈赠海螺承载着对受赠者“美名远扬四海”的深切祈愿。他郑重表示,会亲自将这意义非凡的礼物带到北京交给我。

西藏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为何这来自深海的白色海螺会成为藏族人民心中祈福的圣物?这好奇引领我探寻它的渊源。原来,距今约2.8亿年前,广袤的青藏高原曾是名为“特提斯”的浩瀚海洋,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海螺便是这远古海洋的遗存,成为高原与海洋在时间长河中相连的奇妙见证。大约5000年前,随着西藏与古印度的交往,一种名为印度铅螺的白色海螺传入。它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最初是实用的号角,如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中用以集结部众的螺号,其后在漫长的文化漫润中,逐渐升华为佛教圣物。在藏传佛教中,尤为珍贵的右旋白海螺被视为帝释天献给佛陀的圣物,代表“佛音回荡三千年世界”。《大日经》中“吹无上法螺”的记载,更赋予了它唤醒沉迷众生的深刻寓意。加之藏族文化中对

纯净白色的尊崇,白色海螺被赋予了和平、安谧、幸福、吉祥的丰富内涵,最终从神圣的殿堂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成为传递美好祝福的信物。

七月下旬,一个闷热的“桑拿天”,我在西山八大处见到了龙老师。他面色黝黑,双颊带着高原的红晕,一见面便伸出手与我相握,含有关心地说“辛苦你在酷暑中奔波”,随即一个布袋交到我手中。我顾不上寒暄,直盯着这个精美的袋子端详,布袋上半部分以金黄的底色为衬,上面用红、黄、紫、绿、白等鲜艳的丝线绣满了花卉,下半部分拼接了另一种质地的布料,印着规整的十字纹,色彩汇聚了藏族常用的白、黑、红、绿、蓝、棕等,色彩斑斓,别具风情。捧着沉甸甸的布袋,我用心听龙老师用略带口音的普通话讲述海螺的来历。这枚海螺曾赠予他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校求学时的老师吉先加先生,老师得知曾经的学生荣获骏马奖后欣喜不已,专程赶到西宁,将这枚寓意“美名远扬”的海螺赠予龙老师,以此鼓励他继续在文学翻译的道路上深耕。忆起往事,龙老师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当我提及他如今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已然实现了老师的期许时,龙老师只谦逊地谈起近期的创作和未来的计划。我们交谈甚欢,临别前,我与他笑着约定,待他再次获奖之时,我定会继续向他征集承载着文学印记的珍贵资料。

回程途中,静静地躺在斑澜布袋中的白海螺在我手中沉甸甸的,仿佛有了温度与生命,回响着一段师生情深、民族团结的颂歌。老师遵循古老习俗赠螺于学生,寄托深切祝福;学生不负期许,笔耕不辍,将老师的愿望在骏马奖的荣光中化为现实,

并继续在他新的创作计划中延伸生长。白海螺的螺旋纹理,又仿佛诉说着一种独特的生命根脉。龙老师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他从小接受藏文教育,对藏族文化怀有深沉的热爱,这种血脉的联结,使他天然地承载了汉藏双语的滋养。藏语言文学的专业学习更是他文学与翻译生涯的启蒙基石。他身上的汉藏两种文化,并非简单的叠加或拼接,而是自然而然地交汇、融合,最终形成一股更深、更富有生命力的文化脉流。这枚海螺,便是民族文化共生之美的一个微小而珍贵的结晶。它悠长的号声穿透了时空的界限,从远古的特提斯海沉入青藏高原的怀抱,从庄严的佛教法会走入寻常人家的祝福,海螺所承载的和平、吉祥与美名远扬的寓意,在历史长河中从未断绝。这正如龙仁青通过翻译与创作,让一种语言承载的故事与情感,跨越无形的疆界,抵达另一种语言使用者的心灵彼岸。佛陀的“无上法螺”用以唤醒众生觉悟,而这枚海螺的轻声回响,则隐喻着每一个承载着真挚情感与文化自觉的“微小之声”,无论是一个作家的吟唱,还是一个民族器物的低语,只要它源于深厚的根脉与纯粹的热爱,都将在时代的浪潮中荡开涟漪,穿越山川,最终在人类文明壮阔的共鸣中找到永恒的回响。恍惚间,我仿佛听到清越的螺号声,它诉说着所有源于至诚情谊、文化根脉和独特民族魅力的吟唱,终将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悠扬远播,生生不息。

## “都是为了文学工作”

李传锋,土家族作家,两度荣膺“骏马奖”,在

此次集中将其珍贵的个人文学珍藏——著作、手稿、照片、实物、电子文件、精心制作的视频资料悉数慨然捐贈。2024年的夏季,这些承载着精神力量的包裹,带着辗转的风尘,陆续抵达。我轻轻开启每一个纸箱,旧纸张特有的陈香与微尘的气息扑面而来,细小的尘埃在光束中无声飞舞,那一刻,时间仿佛在我身旁悄然凝滞。

自从我向李老师致电表明身份与来意——商议其文学资料捐赠事宜起,他便严谨地对照《征集骏马奖获奖作家资料范围》逐项梳理、筛选、封装、寄送。期间我们用微信往来沟通,李老师言语间总透出一种历经岁月洗礼的温润。每当我因工作疏漏而深感歉疚时,他总给予我宽慰与肯定:“你做得很好!”当我征询对捐赠内容调整的意见时,他诚恳回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听你们的。”而我的每一次致谢,都换来他朴素的信念:“都是为了文学工作。”

李老师曾言“这个征集活动很有意义,自己有幸参与我国新时期民族文学的复兴和发展,亲历过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只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和文物保护意识的缺乏,很多东西没能保留下来”。诚然,文学馆被众多作家视为其精神产物的理想归宿。那些曾属于个体的炽热的文学印记,终将汇入属于整个民族的浩瀚记忆之河,这正是文学馆存在的核心价值。李老师将毕